

今天的东南亚，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华人崇尚儒家文化，两者似乎是泾渭分明。然而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初期，情况并非如此。当年华人中穆斯林不在少数，他们对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都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唐代。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在西亚崛起，几乎与此同时，东亚也建立了强盛的唐帝国，东西两大帝国的兴起，使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阿拉伯的使者、商人、学者源源东来，从而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尤其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阿拉伯、波斯商人云集，成为伊斯兰教最早传播的地区。如扬州，在此侨居的大食、波斯商人多达数千。<sup>①</sup>在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广州，据说侨居的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竟达十多万人。<sup>②</sup>宋代泉州迅速兴起，成为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对外通商大港，“胡贾航海踵至”，<sup>③</sup>成为伊斯兰教徒另一荟萃之地。这些外来的穆斯林在中国娶妻生子，永久定居，并传播伊斯兰教，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的源流。

降至蒙元时代，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人民大量徙居内地，谓之“色目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加上蒙古统治者利用伊斯兰教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伊斯兰教遂传遍全国，形成“回回遍天下”的局面。<sup>④</sup>色目人除了做官以外，大多以经商为业，沿海的对外贸易更是操纵在他们手中。如江淮的沙不丁、乌马儿长期掌管泉府司和市舶司。泉州的蒲寿庚在南宋末就“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曾任提举泉州市舶。<sup>⑤</sup>元军南下时，蒲以城降

元，被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赋予掌管泉州市舶大权，其权势益加煊赫。元中叶蒲寿庚去世之后，代之而起的先是合只铁即刺和马合马丹，<sup>⑥</sup>后有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后者甚至拥有一支由数千穆斯林组成的军队。<sup>⑦</sup>由于穆斯林商人长期控制着泉州的军政大权，泉州成为伊斯兰教的乐土，发展尤为迅速，人称泉州“缠头赤脚半蕃商，火船高檣多海宝”。<sup>⑧</sup>其人数之众多，势力之盛炽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伊斯兰教又有新的发展，不仅教徒增多，而且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回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时就见到，“几乎每个省份，每个较大的城市都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撒拉逊人（指回族）的家族”。<sup>⑨</sup>

由于中国穆斯林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加上经营海外贸易的缘故，对海外情况较为了解，因此很早就开始移居海外。

1972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在文莱寻访华人文化古迹时，发现了一座宋代古墓，其碑文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景定（1260—1264年）是南宋末年的一个年号，景定甲子即公元1264年。虽然墓主是谁，缘何卒于文莱？至今还是个谜，但是无疑这是一个中国穆斯林的墓。据清代蔡永蒹撰《西山杂志》记载：“宋绍定间（1228—1234年），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通判，后升都察院……淳七年（1247年）再使渤泥，后卒于官也。其子有三人焉：长子应、次子甲、三子烈也，应从亡渤泥也”。渤泥即文莱的古称，很可能上述的墓主“蒲公”即蒲宗闵，他与其子蒲应于1247年最后一次出使渤泥后，即侨居渤泥，后终于此地。文莱是东南亚伊斯兰教较早传播的地区，于1364年建立苏丹国，为东南亚最早的伊斯兰

教国家之一,<sup>⑩</sup>伊斯兰教的传入应早于 1363 年的。它的伊斯兰教来自何处,与泉州蒲氏是否有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据《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厝为穆斯林聚居地,“蒲厝宋末背叛蒲寿庚,航海居菲,一日麻逸国,一日蒲端国也”。由此获知,元军占领泉州之年,有一部分效忠宋室的穆斯林不愿接受元朝统治而移居东南亚。

但是中国穆斯林大规模迁徙海外发生于元末明初,究其原因:一是元末战乱频仍,沿海地区人民纷纷出海避乱谋生;二是明初实行海禁,以及对伊斯兰教徒的歧视政策。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下诏:“凡蒙古,色目人应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自相婚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婢”。<sup>⑪</sup>据说洪武十七年(1385年)明朝廷还下令驱逐广东的穆斯林。<sup>⑫</sup>这就迫使许多穆斯林离乡背井,徙居海外。如苏门答腊的旧港,“有南海人梁道明派者,弃乡里往居之,闽广之从为商者数千,推道明为酋长,而施进卿副之”。<sup>⑬</sup>施进卿本人就是一个穆斯林,后被任为旧港宣慰使。<sup>⑭</sup>永乐四年(1406年)梁道明往明廷的使者回到哈直(Ha ji)、马合谟(Ma hmud)和洪熙元年(1425年)旧港宣慰司进奉使亚烈(Ali)、张佛那马等都是穆斯林。<sup>⑮</sup>在爪哇、马欢见到:“一等唐人,皆是广东、章泉等处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sup>⑯</sup>但据巩珍的记述,爪哇唐人“皆投礼回回教门”。<sup>⑰</sup>罗日亦称:爪哇“唐人持斋受戒”,都信奉伊斯兰教。<sup>⑱</sup>可见,当时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华人中,穆斯林恐怕占了大多数。另据《崖县三亚港蒲氏简谱》,其族子孙曾“去番邦”或“死于番邦”者,不可胜数。<sup>⑲</sup>所谓“番邦”,指东南亚国家。

华人穆斯林大批移居东南亚,形成“大分散,少集中”的状况。在印尼群岛,华人穆斯林不仅随处可见,<sup>⑳</sup>而且在明初还形成了一系列华人穆斯林的聚居区,旧港、马六甲、杜板、革儿昔、苏鲁马益皆为其聚居之

地。例如,革儿昔之居民皆为华人,其住处建有一座清真寺,<sup>㉑</sup>可见他们是穆斯林。

## 二

15世纪前后,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 1 促进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从 10 世纪末开始,东西方海上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衰落和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兴起,伊斯兰世界对东方贸易中心从波斯湾转移到红海,<sup>㉒</sup>穆斯林商人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日益崛起,到马木鲁克时期巴执东西方海上贸易之牛耳。穆斯林商人非常活跃,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据点,其中重要的有:古里(Calicut)、坎八叶(Cam bag)、小葛兰(Quilon)、柯枝(Cochin)。穆斯林商人还不断越过马六甲海峡,对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进行渗透,开展贸易和传教活动,如爪哇,“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请致”。<sup>㉓</sup>当时东南亚各国普遍信奉佛教或印度教,有的还信仰原始宗教。但是西方穆斯林商人往往强行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sup>㉔</sup>与此相反,华人穆斯林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获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信赖,而且他们与西方伊斯兰世界也有长期的历史联系,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经验,成为沟通当地人民和外国商人最好的中介人,因此当地政府无不利用华人穆斯林来管理海外贸易。例如:

马六甲:马六甲是当时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心,有四个由外国人担任的港务长(Shah-bandar),其中一个港务长就是中国人,专门管理来自中国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商人。<sup>㉕</sup>

占婆:华人首领彭德庆(Bong Ta Keng)是一名来自云南的穆斯林,被占婆政府任命为官员,以促进海外贸易。<sup>㉖</sup>

革儿昔:满者伯夷国王任命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又称施大娘子俾那智)为革儿昔港务长,专司海上贸易;<sup>⑦</sup>马欢等人也说,新村(即革儿昔)的村主是广东人。

万丹:“王立华人四人为财富(即港务长),番财副二人,名书记 华人谙夷语者为通事,船名一人”。<sup>⑧</sup>

华人穆斯林与其母国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各国政府因此多利用他们代王室或政府从事与中国的海上贸易。根据《明实录》记载,明代东南亚各国,尤其是爪哇派往中国“朝贡”的使者中,很多都是华人穆斯林。如: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遣使阿烈(ALi)。于都万奉表贡方物,谢赐印币”;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爪哇国王杨堆西沙遣头目亚烈。黄扶信贡方物”;闰七月,“爪哇国旧港宣慰司遣正副使亚烈。张佛那马等奉表贡金、银、香、象牙等方物”;宣德二年(1427年)正月,“行在礼部奏,昨爪哇国贡使亚烈。郭信等言乘舟因海风损坏”;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爪哇国王杨堆西沙遣通事亚烈。张显文等来朝贡方物”;宣德四年八月,“爪哇国王杨堆西沙遣使臣亚烈。龚以善等……贡马及方物”;十一月,“爪哇国王杨堆西沙遣使臣亚烈。龚用才等贡方物”;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爪哇国王巴利武遣陪臣亚烈。麦尚职等来朝贡方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谓“朝贡”,无非是一种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形式。

为当地统治者代管代营海外贸易者属于华人穆斯林的上层,人数毕竟只占少数,一般华人穆斯林则大部分居住于沿海地区,以经营民间海上贸易为主。当时马六甲万商云集,“这个城市中居住着从各方来的外国人,他们生活在这里,也有生长在这里的”。<sup>⑨</sup>“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sup>⑩</sup>其中“间有白者,唐人种也”,<sup>⑪</sup>华人穆斯林经营的海上商业极其繁盛。皮里士曾报告:“在马

六甲,各民族商人必须以货物的百分之一或二作为进献国王、盘陀河罗、天猛公和港务长的礼物。此乃普遍之习惯,来自中国的礼品比来自其他所有地方的都要多,因为交付礼物的海上贸易商的数量非常可观”。<sup>⑫</sup>

爪哇在16世纪初之前,华人穆斯林也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皮里士说:爪哇沿海地区的穆斯林豪商掌握着帆船和人民,拥有全部的贸易。这些穆斯林豪商不是在该国久居的爪哇人,而是大约70年前在此定居的中国人,波斯人和泰米尔人的后裔,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巨大财富。<sup>⑬</sup>正是因为华人穆斯林在爪哇海上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许多华人穆斯林聚居区吸引来各国商客,成为新兴的贸易港口。如革儿昔,“中华及诸蕃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sup>⑭</sup>它还是爪哇与东部群岛贸易的中心。思吉港(Yortan),彭德庆的孙子彭瑞和也是一名穆斯林,于1447年担任该地华人首领,经过他的开拓,思吉港成为新兴的贸易港。张燮曾描写道:“彼民(指爪哇当地人民)出诣饶洞,与华人贸易。华人所泊者饶洞也。饶洞原野平衍,以石为城”。<sup>⑮</sup>

华人穆斯林从事海上贸易,不仅有利于沟通东西方海上贸易,而且对东南亚地区之间从及对外经济交流起了中介和促进作用,对于推动当地商品经济发展,满足当地人民生活需要都作出重要贡献。

## 2 开发当地经济

华人穆斯林来到东南亚定居,带来中国文明和各种先进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一道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使大片荒野沼泽成为良田,虎狼出没的丛林成为都市,人迹罕至的海滩成为著名的海港,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旧港,原来“国无所产”,<sup>⑯</sup>“用水则有巨浸之患”,农业生产极其原始落后,经常发生“岁旱而谷贵”。<sup>⑰</sup>自从华人移居此地,设立旧港宣慰使司治理之后,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一跃成为“田土甚肥,倍

于他壤，谚（原文为“古”，据《瀛涯胜览》改一引者）云一季种谷，三季生金，言其米谷盛而为金也，民故富饶”之地。<sup>③</sup>华人后代务农者亦不乏其人，连西方人也称赞他们为“最能干的耕耘者”，“永不疲倦地耕耘土地”。<sup>④</sup>

在爪哇的杜板，“其间多有中国人，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各地番人多到此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买者，民甚般富”。<sup>⑤</sup>革儿昔创建之初，人口仅千余家，经过华人的开拓，100年之后的1523年竟发展成拥有3万穆斯林人口的繁华港口城市。<sup>⑥</sup>至于岸佩尔（Ngamrel）、淡目（Demak）等也是由华人穆斯林与当地人民一道砍伐丛林，开垦土地，建立住所，从而发展成为重要的都市。<sup>⑦</sup>

### 三

早期的华人穆斯林不仅对当地社会经济开发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东南亚的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传播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15世纪之前，东南亚各国流行佛教和印度教，有的甚至还信奉原始宗教，如爪哇土人“崇信鬼教”，被佛书称为“鬼国”。<sup>⑧</sup>伊斯兰教传入较晚，直到13世纪末，才开始有一些传教活动，但影响不大。除了苏门答腊西北少数地区之外，教徒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然而到14世纪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且在15—16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成为印尼占支配地位的现象。<sup>⑨</sup>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人，阿拉伯—波斯人，中国人都在早期阶段作出了贡献”。<sup>⑩</sup>

早在郑和下西洋时，郑和曾通过把海外华人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对当地居民宣传伊斯兰教，所以“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华人回教社区，接着在1411年，在

安哥（Ancol）即椰嘉达、宝里汶（Grebong），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sup>⑪</sup>陈育崧先生指出：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既是穆斯林，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儿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兰教社团，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兰教的工作”。<sup>⑫</sup>

在华人穆斯林社区中，旧港是最早建立的一个，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从这里先传到东爪哇的港口城市，在那里形成新的传教中心，然后沿海岸向中爪哇和西爪哇传播，最后传遍爪哇岛和印尼群岛。在传教中，出现了一批所谓的伊斯兰教贤人，他们的传教方式大都是率领信徒到一个地区，召募当地人民开垦，在他们之间传教，形成穆斯林教区，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力量不断增强，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从而扩大伊斯兰教的传播。这批贤人中不少是华人，都与旧港结下不解之缘。以下着重介绍彭瑞和和苏南·基里

彭瑞和是占城华人首领彭德庆的孙子，《爪哇纪年》中称为罗登·拉赫迈特（Raden Rachmat），在占城受过良好的伊斯兰教育。<sup>⑬</sup>根据《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彭瑞和为了帮助旧港华人首领孙龙的传教工作，于1445年离开占城去旧港，翌年又到爪哇，致力于在岸佩尔、泗水（苏鲁马益）、淡目等地从事传教工作，使大批爪哇人改奉伊斯兰教，从而在岸佩尔建立起第一个爪哇人的穆斯林社区。由于他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作出突出贡献，被奉为爪哇的伊斯兰九贤之一，被称为苏南·岸佩尔（Sunan Ngampel）。<sup>⑭</sup>彭瑞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养子，三人后来都是爪哇九贤的成员，即苏南·波囊（Sunan Bonang）、苏南·达查（Sunan Drajat）和养子苏南·义礼（即苏南·基里）。<sup>⑮</sup>

苏南·基里（Sunan Coiri）原名罗登·巴古（Raden Paku），也是施二姐的养子。施进卿死后，其女施二姐继承了旧港宣慰使的

职务。施二姐晚年从旧港移居革儿昔,被封为蕃船长,但她非常热心伊斯兰事务和慈善事业,收养了一个男孩。当男孩长到12岁时,为了让他接受伊斯兰教育,她把男孩托付给彭瑞和,彭瑞和为他取了罗登·巴古的名字,并将女儿嫁给他。后来罗登·巴古来到革儿昔附近的基里,开辟了一块教区,在那里建立了清真寺和居所,吸引来大批改教者,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因此被满者伯夷国王任命为革儿昔省的统治者。<sup>①</sup>苏南·基里及其继承人“在向龙目、望加锡、库泰(东加里曼丹)和帕西尔(东南加里曼丹)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征服,婚姻或以前的学生的传教工作传播伊斯兰教”,由于他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是九大贤人中最伟大的一个。<sup>②</sup>

除了上述的“贤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对伊斯兰教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的华人陈文(Jim Bun)。陈文,又名罗登·巴达(Raden Patah),是旧港华人首领孙龙(Suan Leong,又称 Arya Damar)的养子。1474年,当他20岁时,离开旧港来到泗水,投到彭瑞和的门下,成了他的弟子,一年之后,陈文征得彭瑞和的同意,来到三室堑以东的宾陀罗(Bintara),遵照彭瑞和的指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爪哇人的穆斯林社区,传播伊斯兰教,随着他的信徒人数不断增加,其势力迅速壮大,终于在1478年率领伊斯兰教联军击败满者伯夷,建立起爪哇的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淡目王国,<sup>③</sup>从此伊斯兰教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爪哇岛以及群岛其他地区。

在印尼之外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作出贡献。在马六甲,据著名的伊斯兰教史学家法特美教授的研究,“马六甲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受了郑和的影响”。<sup>④</sup>印尼著名的历史学家斯拉默穆利亚纳也认为,“在马六甲的华人穆斯林影响着伊斯兰教的发展”。<sup>⑤</sup>在菲律宾南部,“华人穆

斯林在这个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方面也起了作用”。<sup>⑥</sup>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早期华人穆斯林积极传播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在15世纪以后的短短时期内,“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在宗教史上也许是没有先例的”。<sup>⑦</sup>华人穆斯林对东南亚的文化发展,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时至今日,爪哇现存的建于15世纪的古清真寺,如:泗水的苏南,岸佩尔清真寺,中爪哇曼加德格(Mangadeg)的卡索·纳里曼(Kasan Nariman)清真寺,南勿里达(Blitar)的端·库普(Chung Kup)清真寺和淡目的五家清真寺的建筑形式都与中国式清真寺建筑如出一辙,显然为当年华人穆斯林所建,是他们传播活动的历史见证。另外,在马六甲也有相当数量的古清真寺体现了明显的中国风格,对马六甲清真寺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全马六甲的清真寺,都是仿效中国清真寺的式样而建筑的”。<sup>⑧</sup>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新副研究员)

## 注释:

- ① 《新唐书》,卷144,《田神功传》
- ②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
- ④ 《明史》,卷332,《西域传》
- ⑤ 《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 ⑥ 《元史》,卷22,《武泉本纪》
- ⑦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7,《拾遗》
- ⑧ 宗渤:《全室外集》,卷4,《清源洞图一为洁上人作》
- ⑨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页。
- ⑩ 陞亨·贾米尔:《文莱苏丹二世》,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

第 228 页。

- ⑪ 《明律集解》
- ⑫ Marshall Broumhall, B. A. Islam in Chma, London, 1910, PP34- 35.
- ⑬ 查继佐:《罪堆录》,卷 36,《三佛齐国》
- ⑭ 《明成祖实录》,卷 52
- ⑮ 《明成祖实录》,卷 56;《明宣宗实录》,卷 5
- ⑯ ⑰ ⑱ ⑲ ⑳ 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
- ㉑ 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
- ㉒ 罗日:《咸宾录》,卷 6,《爪哇》。
- ㉓ 罗香林:《蒲寿庚研究》,中国学社,1949,第 222 页。
- ㉔ Denys Lombard & Claudine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Indonesia", 1993, No. 57 (April).
- ㉕ Sri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The Hisong of Java, London. 1821, Vol. II. P115.
- ㉖ cf.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Ulniversity Press, 1985, p58.
- ㉗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37 页,566 页。Raffles, of, cit, pp113- 115, 118.
- ㉘ Braz de Albuquerque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fonso Dalboquerque, Hakluyt Soc, London, 1875- 1884, Vol, S, P87.
- ㉙ ④⑨ ⑤⑧ Slametmuljana Islam K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南洋学报》,第 27 卷,1972 年第 1 2 期合辑。
- ㉚ ④⑦ ⑤④ 陈育崧:《中国回教徒对于东南亚回教传播工作的贡献》,《南洋学报》,第 30 卷,第 1 2 期,1975- 1976 年。
- ㉛ 张燮:《东西洋考》,卷 3,《下港》
- ㉜ 温斯泰德:《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58,

第 67 页。

- ③⑩ 马欢:《瀛涯胜览·满刺加国》
- ③⑪ 费信:《星槎胜览·满刺加国》
- ③⑫ Armand Cortesao (ed & transl):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Erancisco Rodrigues, London, 1944, pp273- 274.
- ③⑬ Ibid, p182.
- ③⑭ 《明史》,卷 324,《爪哇传》
- ③⑮ 张燮:《东西洋考》,卷 4,《苏吉丹》。
- ③⑯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3,《三佛齐国》
- ③⑰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
- ③⑱ 费信:《星槎胜览·旧港》
- ③⑲ 马斯登:《苏门答腊史》,1784 年伦敦版。
- ④① B. Schrieke, Indonesian Sociolgcsl Studies, Part one, The Hague, 1955, p25.
- ④② cf. Rafflec, The History of Java, op, cit, vol, II p124,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 Singapore, 1976, pp252- 253.
- ④④ S. Q. 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 Singapore, 1963, p91.
- ④⑤ Fatimi, Ibid, p36.
- ④⑥ 李炯才:《印尼一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84 页。
- ④⑧ Raffles, op cit, p117.
- ④⑩ 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思想战线》,1983 年第 6 期
- ④⑪ Raffles, op cit, pp118- 119.
- ④⑫ 梅·加·李克莱弗斯著:《印度尼西亚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55 页。
- ④⑬ Slametmuljara A Story of Majapahit, op. cit, pp252- 255.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op. cit, pp128- 131.
- ④⑭ Slametmutjana A Story of Majapalh, op. cit, p210
- ④⑮ 梅·加·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史》,第 10 页。
- ④⑰ Fatimi, op. cit, p93.